



Committed to Improving  
Economic Policy.

## Research Note

2021.8.27(Y-Research RN103)

柯马克 (Mark Kruger) / 第一财经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

[www.cbnri.com](http://www.cbnri.com)

研究简报

中国观察

# 中美中产阶级友好的外交政策

## 摘要

近日，34个美国商业组织致信美国政府，要求其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往来。美国政府积极回应商业组织的要求对于拜登实现为中产阶级服务的目标大有帮助。两国之间存在许多未解决的分歧，例如，商业组织提到的补贴、政府采购、数字贸易、数据治理、美国制造商品的市场准入壁垒以及许多其他长期存在且未解决的问题。鉴于美国和中国在全球重要性，这些问题需要得到解决，最好是以透明和公平的方式，在适当的情况下通过多边协商解决。

## 正文

作者：柯马克（Mark Kruger）/第一财经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

几周前，我们观察了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和欧洲公司表达的态度。调查显示，他们对利润空间正变得相对更大的中国市场的态度越来越坚定。虽然营商环境正在改善，但如果这些外国公司拥有与国内竞争对手相同的机会，他们将增加在中国市场的投资。

本周，我们将关注经营对中国进出口生意的美国公司的观点。

8月5日，包括爱达荷州马铃薯委员会（Idaho Potato Commission）、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ecurities Industry and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 SIFMA）、半导体行业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以及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American Apparel and Footwear Association）在内的34个美国商业组织致信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和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要求美国政府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具体要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他们敦促美国与中国政府合作，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下的所有结构性承诺。

其次，他们要求美国政府恢复对2020年免税到期的产品的关税豁免。此外，他们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公平的、透明的”程序来确定哪些产品可以免除关税。

第三，他们建议美国与中国进行谈判，尽快取消“两国间的

那些适得其反的关税”。

虽然很难说美国政府会如何回应这些信件，但我们仍然看到中美关系开始升温的令人鼓舞的迹象。

7月下旬，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在天津会见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谢尔曼强调，尽管美国“欢迎与中国的激烈竞争”，但并“不想与中国发生冲突”。此外，她强调了中美在气候危机、毒品管制、防止核扩散和其他区域性问题上开展合作的重要性。

另一个积极的进展是，在谢尔曼访问前不久，美国撤销了对五名中国学者在签证申请过程中隐瞒其军事背景的诉讼。

当然，这些只是两国建立互信、加强合作进程中的一小步。前路注定坎坷。最终，美国政府将基于战略考虑对商业组织信函中的请求做出回应。但在这方面，也有理由乐观。

美国总统拜登在推进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时说：“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工薪家庭。”

他表示，“贸易政策必须壮大美国中产阶级，创造新的更好的就业机会，提高工资，并加强社区的凝聚力。”

我认为，政府积极回应商业组织的要求对实现这些目标大有帮助。

据 34 家商业组织介绍，中国政府已经达到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重要基准并兑现了承诺。他们认为，这给“美国企业、农民、牧场主和工人”带来了好处。信中特别提到了落实金融市场开放和解决大多数长期存在的农产品市场准入壁垒的重要性。

相反，这些组织强调关税对美国消费者、制造商、服务提供商和

企业造成的伤害。他们引用了穆迪的分析，该分析显示，关税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美国人身上——美国进口商为受影响的中国产品多支付了约 18.5%，而中国出口商多支付了不到 1.5%。他们还提到了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估计，即仅在 2020 年，关税令美国普通家庭的开支增加近 1300 美元。

在同一份报告中，CBO 估计，贸易壁垒使美国 2020 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降低了 0.5%。其负面影响预计将持续长达十年，到 2030 年，美国的 GDP 水平仍将比“没有贸易壁垒”的情形下低 0.1%。在 GDP 潜在增长率预估为 1.7% 的情况下，产出损失明显。这些必然会减少中产阶层的收入和就业。

这些商业组织强调关税如何增加他们制造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成本。关税推高了国内产品的价格，降低了美国出口产品在国外的吸引力。事实上，美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对手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不征收关税，或其产品进入中国不征收关税。只要关税仍然存在，这些组织就会要求政府通过恢复对特定商品的关税豁免程序来“减轻对美国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损害”。

尽管看起来，按照信中提出的思路与中国接触确实可能是中产阶层友好的贸易政策，但很明显，两国之间存在许多未解决的分歧。例如，商业组织提到的补贴、政府采购、数字贸易、数据治理、美国制造商品的市场准入壁垒以及许多其他长期存在且未解决的问题。

鉴于美国和中国的全球重要性，这些问题需要得到解决，最好是以透明和公平的方式，在适当的情况下通过多边协商解决。

以补贴为例。

各主要经济体似乎都曾不时地进行某种形式的补贴。直到最近，美国人和欧洲人宣布休战，结束了长达 17 年的空客-波音补贴战，这是很有启发性的。

一些补贴可能是有益的。例如，补贴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可能会纠正与燃烧化石燃料相关的负外部性问题，并刺激向低碳经济的过渡。一些补贴可能会促进具有巨大社会效益的研发活动。

解决补贴问题，需要按照查德·布朗(Chad Brown)和詹妮弗·希尔曼(Jennifer Hillman)的建议进行创造性思考。他们的想法是将补贴分为三类。允许的或“绿灯”补贴将是那些用于促进公共利益的补贴，如应对气候变化。各国将承诺限制其对“琥珀色灯”补贴的支出，这些补贴可能会扭曲生产和贸易。被禁止的或“红灯”补贴将是那些直接促进出口或偏护国内产品超过进口产品的补贴。

就这样的框架达成国际协议需要时间——可能会长达 17 年！然而，34 个美国商业组织提议的深化接触似乎是解决此类长期分歧的正确起点。